

芥川龙之介

五卷装

全集

第①卷

小说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高慧勤 魏大海 主编

策划 路英勇

责任编辑 郇玉华

封面设计 洪波

封面设计 洪波

封面设计 洪波

芥川龙之介全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芥川龙之介全集. 第1卷/[日]芥川龙之介著; 郑民钦, 魏大海, 侯为译. —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5. 3

ISBN 7-5329-2367-3

I. 芥… II. ①日…②郑…③魏…④侯…
III. ①芥川龙之介—全集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0726 号

主管部门	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	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	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	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	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版 次	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/124.125 插页/19 千字/2872
印 数	1 - 3000
定 价	180.00 元 (全五卷)

前 言

高慧勤

一九一六年二月，芥川龙之介在大学毕业前夕，创作伊始，于《新思潮》复刊号上发表短篇小说《鼻子》，文坛大家夏目漱石读毕，即亲笔致函，称赞不已：“小说十分有趣。首尾相顾，无戏谑之笔，却有滑稽之妙，不失上品。一见之下，材料非常新颖，结构相当完整，令人敬服。像这样的小说，若再写上二三十篇，必将成为文坛上无与伦比的作家。”芥川果不负所望，佳作迭出，成为日本短篇一大家。悠悠岁月，大浪淘沙，一个现代作家，能经得起时间的筛选，能在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席，具有文学史的意义，足以代表一国的文学，为世界所认同，当自有其卓绝之处。

上世纪初，日本文学经过自然主义的狂飙，从观念、内容到形式，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变。但是，由于这种文学十分强调客观，追求真实，排斥虚构，忽视了小说的技巧和艺术，有重内容轻形式之嫌，进而又发展成专写作家身边事的“私小说”。这类作品，虽不乏细节的真实，却缺少新鲜灵动的艺术魅力。为此，一代一代的作家殚精竭虑，致力于艺术形式与技巧的探索。是芥川，打破了那种单一、刻板的创作模式，拨正了自然主义的“跛脚发展”。芥川龙之介同素有“短篇小说之神”美称的白桦派作家志贺直哉，将明治初年由国木田独步

所奠定的日本短篇小说这一样式发展到极致。志贺直哉从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着笔，出于日本人的偏爱，被誉为写心境小说的能手。而芥川龙之介，着意于吸纳西方现代小说的方法，将虚构的方式重新引入文学的创作之中，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风。他不是以日本独有的话语方式写作，而是采用世界都能理解的手法构筑他的小说。

芥川龙之介，以其三十五年短暂的生命，写出不少精彩的短篇，为日本和世界留下若干不朽的华章。

出生的烦恼

芥川龙之介，一八九二年生于东京，生当辰年辰月辰时，故取名龙之介。父名新原敏三，经营牛奶业并拥有牧场。母亲芥川富久，于龙之介出生后八个月精神失常。母兄芥川道章无子，龙之介遂由舅父收养。一九〇二年，生母去世，过了两年，十二岁时，生父废去其长子继承权，一个月后，销去他在新原家的户籍，由此，龙之介正式成为芥川家的养子，易姓芥川。养父在东京府任土木科长，家道是没落的旧世家，虽小有财产，却也要撙节度日。按照芥川的自述，养父家属于“中产阶级的下层，为维持体面，不得不格外苦熬”（《大导寺信辅的半生·五贫困》）。这样的家庭，家教严格，礼法繁缛，作为养子的龙之介，少不得事事都要学会隐忍。养父一家颇好文艺，具有江户文人趣味，故芥川自幼便受传统文化的熏陶，很早即接触日本和中国古典文学。尽管大姨母富纪一生未嫁，犹如生母一般养育、呵护龙之介，但是，因爱成恨，彼此伤害的事，自是难免。芥川曾对作家佐藤春夫说过：“造成我一生不幸的，就是××。说来她还是我唯一的恩人呢。”生母发

狂，为人养子，个性压抑，终生背着精神负累，这是芥川龙之介与生俱来的不幸，是他的命运。他弃世前给至友小穴隆一的遗书中写道：“我是个养子。在养父家里，从未说过任性的话，做过任性的事（与其说是没说过、没做过，倒不如说是没法说、没法做更合适）……如今，自杀在即。也许这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次任性吧。我也与所有的青年一样，有过种种梦想。可如今看来，我毕竟是疯子所生的儿子。”看得出，芥川终其一生，为生母发狂，为身为养子，而苦恼不已。

芥川自幼身体孱弱，非常聪敏，但有些神经质。成绩一向优秀。据说“但将落叶焚，夜见守护神”，是他小学四年级时作的俳句，显示出早熟的文学才能。中学时代，酷嗜读书，汉文修养出类拔萃，除日本文学外，广泛涉猎欧美文学，开始接触易卜生、法朗士、梅里美等西方作家的作品。中学毕业时，成绩优异，受到表彰，免试入第一高等学校；同学中，有日后成为作家或诗人的久米正雄、菊池宽、山本有三、土屋文明、藤森成吉以及丰岛与志雄等。或许这也是命运使然，倘若他不曾结识这些朋友，或许就不会走上作家之路。一九一二年，写有散文《大川之水》，以抒情的笔调，略带青春的感伤，描写他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大川端一带，表达他对乡土的热爱。翌年，以第二名的成绩，由一高毕业，并于当年九月，升入东京大学英语专业。一九一四年二月，同丰岛与志雄、久米正雄、菊池宽、山本有三这些未来的作家，第三次复刊《新思潮》。芥川先后发表处女作《老年》、剧本《青年与死》等。文学史上，特将他们称之为“新思潮派”作家。一九一五年，芥川于《帝国文学》上发表小说《罗生门》，可惜这一名篇当时未引起文坛重视。这一年，经同学林原耕三介绍，出席夏目漱石的“木曜会”，由此以师事之。鲁迅当年曾推崇夏目漱石是

“明治文坛上新江戸艺术的主流，当世无与匹者”。

大学毕业前夕，即一九一六年二月，芥川龙之介又同久米正雄和菊池宽等五人第四次复刊《新思潮》，芥川于复刊号上发表前文提到的小说《鼻子》。芥川见重于这位“当世无与匹者”，自我策励，相继发表《孤独地狱》、《父亲》、《酒虫》等作。经夏目门生铃木三重吉推荐，开始为《新小说》写稿，刊出《山药粥》，随后又于《中央公论》发表《手绢》。芥川时年二十四岁。一个不为人知的无名作家，能在《新小说》和《中央公论》这两大刊物上发表作品，崭露头角，深受好评，实属难得。芥川终于以其创作实绩，奠定其新进作家的地位，登上文坛。当年七月，芥川以第二名的成绩，由东大英文专业毕业，论文题目为《威廉·莫里斯研究》。毕业后，一度在横须贺海军机关学校教授英语，不过三年便辞去教职，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，开始其专业作家的生涯。

古典的发现

同许多作家比，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时间不能说长，如果从一九一四年算起，前后不过十三年，共创作短篇小说一百四十八篇（其中《掉头的故事》一篇内容欠妥，故本书未收入），并小品、随笔、诗歌、游记、评论多种。其小说可分为历史与现代两类。早期以历史题材居多，晚期以现代生活为主。

芥川不是那种以自己丰富的经历进行创作的作家。他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五年，人生经历并不复杂，基本上是一介书生，坐在书斋里以写作为生的文人。但他性喜读书，还在“十二岁念小学时，便常常夹着饭盒和笔记本，走上十二里路，去图书馆”看书。他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书本学来的，“为了了解人

生，他不是去观察街头的行人。毋宁说，是为观察街头的行人，才先去了解书中的人生。……欧洲世纪末的小说和戏剧，让他发现，在冰冷的寒光中所展现的人间喜剧”，走的是“从书本到现实”（《大导寺信辅的半生》）的路线。芥川不仅从书中认识人生，了解人性，同时也从书中取材。他毫不隐讳地说，其小说素材，“大抵得之于旧书”（《我与创作》）。他能从书中读出自己的体会和心得，借书意发挥，触发灵机，巧手妙裁，构思自己的短篇华章，“在艺术上予以强有力的表现”。

给他带来成功的《罗生门》和《鼻子》，便属于历史类，取材于日本十二世纪的一部短篇故事集《今昔物语》，无论在主题或是艺术上，一向视为芥川的代表作。已经写出《狂人日记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故乡》等名篇的鲁迅，早在一九二三年，芥川还在世时，就已译介了这两篇作品，收入《日本现代小说集》。芥川曾撰文《中国翻译的日本小说》，特别提及此事。《罗生门》以微带嘲讽的文体，写一个被主公解雇的下人，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，面对生存的危机关头，展示他内心的道德冲突：是当强盗，还是饿死？其结果是，为了一己之生存，只能不顾他人死活，揭示出人性恶的一面。小说在短短三四千字的篇幅中，提出人性利己这一深刻主题。《鼻子》，围绕老僧禅智内供的长鼻，以犀利的笔锋，挖掘“旁观者的利己主义”与幸灾乐祸，以及人对生存的不安与苦恼；作品在艺术上，较《罗生门》更为精纯工整。久米正雄说，《鼻子》既是芥川的处女作，也是他“最后”的作品，最为完美，最为成功。（《鼻子与芥川龙之介》）

由于芥川熟悉典籍，自然是先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中撷取精华，写成立意新颖、精致优美的作品。他向历史寻求美的理想，汲取创作的源泉，发掘古今人类共同的人性、一脉相通

的心理。他从《今昔物语》看出“野性之美”，深感其中跃动着艺术的生命，认为这部古书以“最野蛮、最残酷的方式，描写了古人的痛苦……是王朝时代的人间喜剧”（《关于〈今昔物语〉》）。除《罗生门》、《鼻子》外，他还据此写出《山药粥》、《竹林中》、《六宫公主》等名篇佳作。因他家庭颇富江户传统文化情趣，故有《大石内藏助的一天》、《枯野抄》、《戏作三昧》、《报恩记》、《丝女纪事》等作。由于汉文学很有功底，故成功写出《女体》、《黄粱梦》、《英雄之器》、《杜子春》、《秋山图》、《南京的基督》、《湖南的扇子》等中国题材小说；讲起元代画家来，如数家珍，令身为中国人的笔者都感汗颜。他对宗教十分关心，对神秘事物也甚有兴趣，便写了《烟草与魔鬼》、《基督徒之死》、《鲁西埃尔》、《圣·克利斯朵夫传》、《众神的微笑》等等。不过，芥川的这类作品，都“不以再现历史为目的”，实是借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，借再叙述，作新阐释，予以现代的解读。

例如，在《大石内藏助的一天》里，芥川借用四十七武士为主公复仇的著名史实，剖析主人公大石内藏助的心理：“大业完成后的幻灭感”（参见吉田精一著《芥川龙之介》），与《鼻子》、《山药粥》、《秋山图》等主题相近。再如，在芥川自己“颇感满意”的《枯野抄》中，准确描写了俳谐大师芭蕉临终时，一干弟子的心理活动，于无限悲痛之中，隐含着从大师的人格压力下“解脱的喜悦”。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九日，夏目漱石逝世，芥川为恩师守灵，这篇小说当流露出作者本人几许微妙心情。对于《袈裟和盛远》、《丝女纪事》中的两个女主人公，历史上本已有定评，但在芥川的笔下，竟颠覆了她们作为“烈女”和“贞女”的形象，从另一侧面切入，具有偶像破坏的意味。

从历史中取材，也是芥川艺术表现上的需要。芥川进入文坛时，风行一时的自然主义文学开始衰落，代之以自然主义文学的变种——“私小说”。以芥川为首的新思潮派作家，既反对自然主义那种呆板滞重的纯客观描写，也不认同仅写身边琐事的“私小说”。芥川创作伊始，便拒绝“把自己当成主角，将自家一己的私事，不知羞耻地写给人看”（《澄江堂杂记》）。还说：“把‘私小说’说成是散文的正道，看来恐怕是一种谬论。”（《〈论“私小说”〉一文浅见》）所以，芥川没有走前人铺就的“私小说”这条路，而是另辟蹊径，采用虚构的方法，营造自己的艺术殿堂。芥川曾在随笔《澄江堂杂记》中，就自己为什么写“历史”小说做过解释：“我设定一个主题，为了在艺术上予以强有力的表现，需要借助某一异常事件。倘如把这一异常事件写成发生在今天的日本……读者会感到不自然。为此只能假托是过去发生的事，或是日本以外的地方现时发生的事，或是日本以外的地方过去发生的事。我之所以取材于历史，都是迫于这种需要……借助历史的舞台”，演出当今的悲剧，穿着古人的服装，赋予今人的个性。换言之，芥川从古典中发现了现代，或曰，赋予古典以现代意义。

人性的探求

读芥川的小说，常让人惊讶：他对人，对人性，怎么会有如许深刻的认识 and 了解！在细小琐碎平平常常的事物中，竟能将人性的某些方面，剖析得那么尖锐而透彻！芥川自己曾说过：“我经常对‘人性’表示轻蔑，那是事实。但又常常对‘人性’感到喜爱，那也是事实。”轻蔑，是因为看到人性的弱点；喜爱，是借故事新编能写出新意来。芥川擅长短篇，限

于篇幅，不可能对广阔的社会生活作气势磅礴的描绘。但他作品的精妙之处，却不乏对社会人生做哲理的探求和索解。世间的尔虞我诈，人性的自私自利，芥川有深切的了解，所以常常通过不同题材来挖掘人性中的这种利己本质。而这种索解，又导致他的悲观失望和怀疑主义。正如鲁迅所说，芥川的作品，“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之后的不安，或者正不安时之心情”。《罗生门》和《鼻子》都触及到人性中的根本问题。可以说是芥川创作的基本主题，直到他最后的遗稿，都贯穿着这种对人性利己的剖析，对丑恶现实的鞭挞以及对生存的不安与苦恼。

一九一四年夏，芥川龙之介爱上一女孩，遭到养父家，尤其是大姨母的反対，他“哭了通宵”，不得已于翌年年初与女孩分手。此事对他影响甚大，平生第一次在人生大事上遭遇挫折——触碰到人的自私，哪怕是亲人也不例外。他为人性的根本问题而苦恼。所以他问：“究竟有没有无私的爱？……倘若没有，人生会无比的痛苦。”（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致恒藤恭）与此同时，他也更加意识到身为养子的不幸。心境消沉，于是寄情于创作，先后写出《罗生门》和《鼻子》。因为他“想摆脱现实，尽可能写得愉快些”（《文友旧事》），便从《今昔物语》中拈出相关素材，以此表现自己对人性的思考与认识。在《罗生门》里，芥川表现了人的利己本性，通过《蜘蛛之丝》，则进一步揭示这一利己本性足以导致人的毁灭：纤纤一根蛛丝，上通天堂，下连地狱，虽是大盗，但有一善举即可超升天堂，而萌生恶念便永堕苦海。小说原本是当作童话写给孩子看的，写得珠圆玉润，清通简约，仅两千余字，篇章虽小，所喻甚大，仿佛是一篇佛经故事。无怪乎身为作家的主编铃木三重吉看到此稿，不禁“叹为名作，实乃童话创作之

最高范本”。据日本学者考证，小说取材于法国宗教学者保罗·卡吕（Paul Carus, 1852 - 1919）所著《业》（KARMA）一书。不过，芥川舍弃了原作中抽象的说教，能匠心独运，推陈出新，从中抉发古今人类天性中缺憾的一面，写成一篇寓意深刻的哲理短章。

在表现这一类主题的作品中，如以内容的丰富、寓意的深刻、手法的别致、技巧的完美而论，当推《竹林中》一篇：竹林中发生一起凶杀案，有个年轻武士被杀，美貌的妻子遭到大盗的凌辱。可是大盗与妻子各执一词，都自供是凶手。而死者亡灵借灵媒之口却说是自杀身亡。那么究竟谁是凶手呢？小说没有结论。整篇作品由七个人的口供组成，从各自的角度提供不同的说法，案情扑朔迷离，疑团重重，悬念始终未予解决。七段口供以三个当事人的最为关键，其中必有人将真情隐去，补以谎话，或每人的话里都有真有假。那么，他们为什么要说谎呢？可见，每人心里都有不可告人的隐情。作者的用意似乎想说明：人常要用谎言来文过饰非，事实的真相常被歪曲隐没，以致客观真理不可认识。芥川在小说中，暗喻人心微妙，难以捉摸，表现一种怀疑主义情绪，他自称“一向是个怀疑派”（《河童》十五）。小说故意留下空白，耐人寻味。写的虽是一桩情杀案，却不是通俗的破案小说，而是通过这个没有结论的案子，引导读者去探求人性的弱点，深意自见。

芥川在探讨人生、考察人性的过程中，发现了人世间的丑恶。“周围净是丑恶。自己也丑恶……面对周围的丑恶，活着就是一种痛苦的事。”（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致恒藤恭）所以，他不能不感到失望。这种失望感，见诸《鼻子》、《山药粥》等作品中。《鼻子》已如前所述。《山药粥》是写一个处处受人嘲弄的下级武士，一生的唯一愿望是痛快地喝一顿在

当地视为美味的山药粥。可是，武士一旦有机会实现自己的“理想”时，不知怎的，竟倒了胃口。小说喻示理想永远存在于追求之中，一经实现，随即幻灭。“神韵缥缈”的《秋山图》，也属同类主题。取材恽南田《瓯香馆画跋》中《记秋山图始末》一文，假托元朝画家黄大痴的“秋山图”，奉为画中神品，但等见到实物，在鉴赏者眼中，竟成下品。神品“秋山图”——美和理想，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之中。其实，这也是作者本人心情的写照，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幻灭感。

芥川的小说，因探求人性，而揭露出人性恶，但并非为揭露而揭露，实是他对人性善的一种向往，追求美好愿望的一种折射。他给同学井川恭的信中写道：“读波德莱尔的散文诗，最令人感动的，不是对恶的赞美，而是他对善的憧憬……”（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）这也是芥川的“憧憬”。

“艺术即表现”

大凡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，创作上都不会无视技巧的锤炼。芥川当然也不例外。自知不是行动的巨人，遂把自己的艺文随感戏称为《侏儒的话》。其中有多处谈到创作，认为艺事除了人力，还要靠天分，并引赵瓯北七绝云：“少时学语苦难圆，唯道功夫半未全。到老始知非力取，三分人事七分天。”在日本，芥川的天分一向有“鬼才”之称，而这位“鬼才”，却极为重视艺术的表现。他在《艺术及其他》一文中说，任何一种艺术活动都是艺术家“有意识”的创造。“艺术家首先应尽力使作品完美。否则，献身艺术，便毫无意义可言。”并反复强调：“艺术始于表现，终于表现”，“艺术即表现。而所

表现者，乃作家其人。”他认为，作家尤应具有创新精神，所以，他“同情艺术上的一切叛逆精神”。在另一篇文章中，他还主张：艺术家，须以追求完美为务，实现其艺术上的理想，“不论情愿与否，都应磨炼技巧”，“须臾不可怠惰”。因为“技巧是表现内容，创造形式的手段”（《文艺讲座：文艺概论》）。那些“轻视技巧的人，压根儿不懂艺术”。倘若艺术家在艺术表现上“不能令人陶醉，作为小说家便不算胜任”（《小说作法十则》）。毫无疑问，作为小说家，芥川可谓胜任。其作品历经八十余载，至今犹保持鲜活的生命力与艺术美感，究其原因，便是芥川对艺术表现的重视，对写作技巧的锤炼，对艺术理想境界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苦心孤诣的独到功夫。

芥川乍登文坛，便显得身手不凡。每作都锐意精进，不断创新，再三锤炼。不论是现代题材，抑或是历史题材，都可以说几近完美，臻于艺术精品。除上面提到的几篇外，像《戏作三昧》、《蜘蛛之丝》、《地狱变》、《基督徒之死》、《圣·克利斯朵夫传》、《舞会》、《秋山图》、《山鹑》、《竹林中》、《一块地》以及《玄鹤山房》等，都写得相当精致，立意警拔，形式多样，文字简洁，富于节奏感，极有表现力。芥川的小说，一般不大渲染社会环境，主要从人物的心理变化，揭示矛盾，展开情节，刻画性格。描写人物时，用超然的态度，冷峻的笔调，至多对他同情的人物给予一点善意的揶揄，对他否定的人物加以一点微讽。谋篇布局，可以说是极尽巧思，具有一种形式美和结构美，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。

芥川虽然“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”，但艺术上始终作不懈的追求，“把创作视为生命”（《齿轮》）。甚至说，为了写出“非凡的作品，有时难免要把灵魂出卖给魔鬼”（《艺术及其

他》)。从这种对美的追求以及为表现内容而对形式的经营中，不难看出芥川创作上的唯美倾向。他本有一颗纤细而敏感的心，现实的丑恶鄙俗使他厌恶；严格的家教，束缚了他的个性发展；波德莱尔、法朗士、魏尔伦、易卜生、斯特林堡等欧洲世纪末文学，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也不无影响。他孤独，苦闷，于是潜心于写作，倾毕生精力去追求艺术的理想境界。《戏作三昧》、《地狱变》、《沼泽地》等作品，都可看出他的这种倾向。

《戏作三昧》以江户时代作家马琴为主人公。这位著名戏作小说家，时时为艺术与道德的冲突而感到无所适从。“身为道德家”的马琴，对“先王之道”从未疑心过。可是，“先王之道”赋予艺术的价值，同作为艺术家的他想赋予艺术的价值，却相去甚远。他否定戏作的价值，称之为“劝善惩恶的工具”，“可一旦碰上奔涌而来的艺术灵感，心里立即会感到不安”，对这一艺术价值存有疑问。但是，作家马琴一旦入得创作三昧，艺术便成为至高无上。“他那有如帝王般威严的眼睛里，既不是利害得失，也非爱恨情仇，更看不到一丝一毫为毁誉所苦的心怀，而是充满不可思议的喜悦。或者说，那是一种感激之情，悲壮得让人神往。不懂得这种感激之情，怎能咂摸到戏作三昧的甘美呢？又怎能理解戏作家庄严的灵魂呢？这不正是‘人生’吗？残渣污秽荡尽之后，仿佛一块崭新的矿石，光彩夺目，呈现在作者面前……”这是小说的最后一段，既写马琴，也是芥川本人的抒怀。“我的马琴仅为表述自己的心情而假托其人。”（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九日致渡边库辅）借马琴抒发自己的思想、感情，吐露创作的甘苦。

《地狱变》又进一步，孤高倨傲的画师良秀，虽然能超越世俗，摈弃一切利害打算，为了艺术的完美，不惜牺牲一切，

甚至女儿的生命，可是，画出稀世杰作之后，他终究悬梁自尽了。在艺术上，良秀是成功的，但现实里，他却失败了。《戏作三昧》里，艺术是崇高的、庄严的，艺术家“有如帝王般威严”；但在《地狱变》中，面对现实，面对强权，艺术家只有失败的份儿。艺术家在艺术与道德的冲突中，在与强权的对立中，作家芥川，不得不给良秀安排这一悲剧结局。“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，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。”（普列汉诺夫《艺术与社会生活》）良秀的悲剧，也是芥川的悲剧。从孤高自傲、献身艺术的画家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芥川龙之介作为一个高尚正直的作家，面对龌龊鄙俗的现实，不肯随波逐流、屈从时势的狷介态度。所以他才说：“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。”（《傻瓜的一生》）

芥川不是有神论者，但由于他道德上的“洁癖”，极为重视人的精神世界。在芥川看来，虔诚的信仰和内心的清明，可以形成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操。弃世前半个月，他完成一篇描写耶稣基督生平的《西方之人》，开头即表明：“我大约在十来年前，开始从艺术的角度喜欢基督教，尤其是天主教。”就是说，从一九一七年前后，芥川开始关注基督教。他最后的绝笔，是弃世前日脱稿的《西方之人》续篇；临终时，摆在枕边的，是一本打开的《圣经》。不过，尽管有位虔诚的朋友一再劝说，他终究未入教，始终是个冷静的旁观者。“要他相信上帝，相信上帝的爱，他毕竟做不到。”（《傻瓜的一生》）诚如芥川所说，他之喜欢基督教，是从“艺术的角度”，是创作的需要。他尤其对殉教者的事迹感兴趣。所以，芥川的小说中，有相当一部分是基督教题材，如《烟草与魔鬼》、《尾形了斋备忘录》、《浪迹天涯的犹太人》、《基督徒之死》、《鲁西

埃尔》、《圣·克利斯朵夫传》、《南京的基督》、《众神的微笑》、《报恩记》、《阿吟》、《丝女纪事》等等。芥川不是讽刺宗教的欺诳，而是赞美那种出自坚执的信仰，对精神的提升。其中最著名的，当属《基督徒之死》与《圣·克利斯朵夫传》，芥川自己也很中意这两篇小说。

《基督徒之死》尤其是这类作品中的“杰作”，也是“他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佳品”（吉田精一）。按照芥川自己的说法，他特意“模仿文录庆长（1592-1615）年间，天草、长崎出版的日本耶稣会布道书的文体”，取其“简素古朴”的氛围，描写“日本圣教徒的轶事”。小说叙述的是主人公罗连卓女扮男装，受诬陷而被逐出教会，但她坚信上帝，以德报怨，最终殉教。这里，芥川看重的不是悲剧的本身，而是那种为信仰奉献一切的牺牲精神，并由此带来生命的升华。小说末尾有这样一段：“却说这女子的生平，除此之外一无所知。究竟是何道理？概而言之，人生刹那间的感铭，实千金难求，至尊至贵。好有一比，人之烦恼心如茫茫夜海，当一波兴起，明月初升，能揽清辉于波上，岂非生命之意义？如此说来，知罗连卓之最后，亦足可知其一生耳。”这一段应是这篇小说的点题之笔。作者所追求的便是这一“千金难求”的“人生刹那间的感铭”，是《戏作三昧》中“悲壮得让人神往”的“感激之情”，是画家良秀孜孜以求的艺术的“法悦”，是生命中最充实、最光辉的瞬间！

芥川致友人函中不止一次说，他喜欢罗曼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。固然这部巨著在中国也影响了几代人，但在芥川来说，想必尤为瞩目于小说的结尾：圣·克利斯朵夫背负基督过河的描写。芥川的这篇《圣·克利斯朵夫传》，即是根据西方“圣人传”而创作的。小说中最为感人的部分，也正

是这段“过河”描写：

约莫一个多时辰，克利斯朵夫历尽艰辛，终于像一头斗得筋疲力尽的狮王，气喘吁吁，摇摇晃晃，爬上了对岸。他将粗粗的柳木拐杖插入沙中，从肩上将童子抱了下来，长吁一口气道：

“哎呀，孩子，连高山大海都没你沉哪！”

童子微微一笑，暴风雨中，头上的金光愈加灿烂辉煌，仰起头望着巨汉的面孔，仁慈地答道：

“不错。今晚，正是今晚，你背负的是一身承受着全世界苦难的耶稣基督！”声音如铃声一般美妙动听……

对未来的“恍惚不安”

芥川前期创作中也有一些现实题材作品，像批判军队中士兵的非人待遇、人不如猴的《猴子》，描写小人物的《毛利先生》，叙述劳动人民纯朴真挚感情的《橘子》，表现人生无常、纵如烟火般辉煌却转瞬即逝的《舞会》，刻画现代男女青年微妙心理的《秋》，嘲讽军神乃木希典的《将军》，描写少年对人生的失意与落寞心情的《斗车》，表彰见义勇为的童话《小白》，以及表现乡间沉重劳作与贫困生活造成婆媳间利己打算的《一块地》……这些现代小说，也都写得颇有特色。但到后期，即一九二五年底，芥川以人生回忆的形式，写了带有自传小说性质的《大导寺信辅的半生》。之后，芥川的创作完全转向了现实，风格与方法也有所改变。由揭露他人的利己主义，进而剖析自己的灵魂深处，客观，冷静，流露出悲凉、沉